

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在日本占領 香港時期的情報活動，1942-1945

鄺智文

摘 要

1941年12月25日，英國在華南的殖民地香港被日軍攻占，至1945年8月成為日軍在華南與南中國海的交通樞紐。在此期間，英軍、國民政府以及中共均曾經在香港建立情報和抵抗組織，與日軍周旋。以往有關日據時期香港軍事歷史的討論，均集中英軍和中共的工作，亦少有將之置於亞太戰場的背景之下。本文利用部分未被引用的中、英、日文史料，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為討論中心，重構國民黨在日據香港的情報工作，並探討其成效影響以及與黨務之間的關係。本文指出，國民黨在粵港地區黨務和武裝力量的不足，加上資源和人才的缺乏，使國民黨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對擊敗日本作用有限，亦未能把握機會擴大國民政府在香港的議價能力。

關鍵詞：香港、九龍、國民黨、情報戰、第二次中日戰爭

The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s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Occupied Hong Kong, 1942-1945

Chi-man Kwong^{*}

Abstract

From 25 December 1941 to 15 August 1945, Hong Kong, a British colony since 1842, was captured by Imperial Japan and was being used as a shipping hub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British,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all tried to organize underground resistance and intelligence groups in Hong Kong.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and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usually focus on resistance activitie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out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se actions. Using Chinese, British, and Japanese primary sources, some of which unus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ll a gap in the study by r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s resistance and intelligence work in Hong Kong and critically assessing its effectiveness. It suggests that shortcomings in the Nationalist Party's party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in Guangdong, and a general lack of resources and suitable personnel, explained the failure of the Nationalists organizations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both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arty's influence in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Kowloon, Kuomintang, intelligence warfar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 Assistant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在日本占領香港 時期的情報活動，1942-1945*

鄺智文**

壹、前言

現代戰爭消耗浩繁、曠日持久。為求料敵機先，甚至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爭指導者不斷嘗試在情報方面壓倒對手。基根（John Keegan）指出，情報戰有5個面向：蒐集（acquisition）、傳遞（delivery）、採納（acceptance）、研判（interpretation）、行動（implementation）。¹ 蒐集與傳遞屬於前線情報人員的工作，他們透過諜報（spying）從敵方得到有用的情報，規避敵人的偵搜，並在情報尚有價值時將之送到己方手上。決策者則要決定是否採納這些情報，判斷是否有詐，然後根據情報研判局勢，並以之作為決策依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電報技術的發達，通訊諜報（signal intelligence，即截收對方電訊）與人力諜報（human intelligence）在情報蒐集與傳遞的過程中同樣重要。² 諜報人員不但利用電訊手法截取對方的通訊，前線的人員更可利用小型無線電臺收發訊息，減低被發現的風險。可是，即使科技使蒐集與傳遞情報的過程比以往更為隱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對文章的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2018年4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7月4日。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¹ John Keegan, *Intelligence in War: Knowledge of the Enemy from Napoleon to Al-Qaeda* (London: Pimlico, 2004), pp. 3-4.

² 本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採取較為宏觀的定義，即以1931年日本入侵東北三省開始，至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結束。

密，但並不能確保情報的質量。此外，如情報人員的警戒意識不足或不可靠，則可能於情報蒐集與傳遞的過程中被發現，甚至被反滲透和收買。因此，參與情報戰的人員與其他作戰人員一樣需要專門的訓練，否則根本不能有效運作。

近年，隨著各國情報部門的檔案陸續解封，軍事史學界日漸熱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情報戰；對於地下抵抗（resistance movement）以及諜報戰均出現系統性的研究。關於情報戰的專著如基根的《戰爭中的情報》（*Intelligence in War*）以及情報研究期刊如《情報與國家安全》（*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等亦相繼出現。以往回憶錄式的論述陸續被更為細緻的研究取代，例如對情報的質素以及情報機構的組成和運作有更深入的討論。這些研究均使用了大量檔案資料；例如，艾德柱（Richard Aldrich）和小谷賢（Ken Kotani）即利用近年解密的英國軍情局檔案（Military Intelligence）、特種部隊檔案（Special Force），以及日本陸軍檔案（陸軍秘密大日記）等資料，重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日本在亞太地區的秘密戰。³

學者近年亦注意到中國戰場的情報戰，其中張霽芝、馬振犢、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中統」）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的研究至為完備。⁴至香港地區的情報戰，以往關於1941年（民國30年、日昭和16年）香港戰役以及日據時期的論述大多均有觸及。盟軍方面的主要組織諸如英軍服務團以及中共的東江縱隊均有相關的專著研究，其中賴德（Edwin Ride，英軍服務團團長賴廉士 Lindsay Ride之子）以及陳瑞璋的研究均使用了英國與中共方面的資料，以及

³ Brian Martin, "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 1939–19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6:4 (Winter 2001), pp. 89-148; Richard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小谷賢，〈日本軍と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成功と失敗の事例から〉，《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1卷第1號（2008年11月），頁43-68；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Oxford; New York: Osprey, 2009).

⁴ 張霽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馬振犢，《國民大會特務活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臺北：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馬振犢、邢燁，《戴笠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馬振犢，《軍統特務活動史：民國第一特工組織的興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年）。

大量訪談紀錄。⁵ 可是，大部分關於日據香港的研究均少有討論國民政府情報人員的工作，亦未有將之與盟軍和國、共兩黨以及地方勢力在華南的抗戰與鬥爭連結起來。現時，只有數篇專論探討國府在港情報工作，包括金以林的〈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朱德蘭的〈從日本軍方檔案資料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壞諜報組織的經過〉、劉維開的〈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以及李盈慧的〈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金以林利用國民黨的《特種檔案》，詳論1937至1941年間國民黨在港工作的狀況與侷限。⁶ 朱文使用日軍香港憲兵部破獲國民黨在港情報網的檔案，以數名在1942年中至1943年春於香港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員為例，展示了使用日軍檔案研究國軍情報工作的潛力。⁷ 劉文以《特種檔案》為基礎，詳論中統人員在日據香港的工作，提出中統人員的主要任務是為盟軍提供軍事情報並肯定其貢獻。⁸ 李文則討論曾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的吳鐵城如何在香港建立國民黨黨務工作。⁹

本文主要承以上劉維開、金以林、朱德蘭、李盈慧的研究為基礎，通過對照部分未被引用的中、英、日檔案，以重構中統在日據香港的情報組織、程序、人員以及目標等，並檢視其情報的性質與素質，並以情報戰中的「蒐集」和「傳遞」兩個面向為中心，一窺中統局情報人員在香港情報戰的成效，以及國民黨黨務與情報工作之關係。雖然軍統在港亦有工作，但由於資料零散，特別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至1944年後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華南開始工作期間的資料缺少，因此本文只集中討論中統在港工作。本文引用的國民政府檔案主要包括1941

⁵ Edwin Ride,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陳瑞璋, 《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

⁶ 金以林, 〈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 《抗日戰爭研究》, 2007年第4期(2007年11月26日), 頁83-106。

⁷ 朱德蘭, 〈從日本軍方檔案資料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過〉, 收入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編, 《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 1996年), 頁69-84。

⁸ 劉維開, 〈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 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 2000年), 頁484-490。

⁹ 李盈慧, 〈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 收入陳鴻瑜主編,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臺北：華僑協會總會；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頁71-72。

至1945年《特種檔案》中關於中統在港澳工作的檔案；日本檔案有香港憲兵隊本部的「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報告以及其他日本海陸軍檔案，例如日本海軍第二遣支艦隊（以香港為基地）的作戰日誌等；英國檔案則主要來自陸軍部軍事情報處（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和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的《伊利沙伯·賴德史料》（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關於英軍服務團的檔案和報告。¹⁰ 本文討論的細節看似與戰爭大局無關重要，卻解釋了何以國民政府黨務與情報人員在此期間於香港的工作始終成效有限，並在日軍投降時未能在九龍和新界地區發揮更大作用。本文亦從微觀角度，討論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與中共及盟國之間一面抗戰，一面傾軋的過程，以及國民政府與盟國建立實質軍事合作的難度。

本文先討論1928至1941年間，中統在香港的情報機構沿革，指出中統在港情報工作一直頗為微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因與英方合作才得以擴張，然後點出日軍占領香港後在防務與情報工作的缺乏，使國、共以及英軍的人員得以繼續在香港活動。本文繼而描述淪陷初期中統在港情報網的恢復過程，以及1943年日軍對盟軍情報系統的掃蕩，提出當時中統人員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政治情報，亦因此在日軍掃蕩中未被全部消滅。本文最後討論戰爭後期中統在港情報工作以及中統特務人員參與爭奪香港的行動，指出當時中統在香港仍沒有適合蒐集軍事情報的人員，因此其情報工作並不理想。國民黨因為日軍與中共在1944至1945年間的行動，逐漸失去對香港鄰近地區的控制，加上其情報機關缺乏合作，因此在日軍投降時爭奪香港的過程中，國民黨在港人員角色有限。

貳、國民黨在港情報布置，1928-1941

1928年國民政府宣布完成北伐後，即於全國建立黨務與情報網絡，香港的工作則由於南京政權對廣東省的控制有限而發展緩慢。1935年，國民黨組織部把中國主要城市和香港的情報工作和交通機構（即負責情報「傳遞」的部門）統一

¹⁰ 「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戰後在日本被發現，其後由姬田光義出版。見姬田光義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88年）。

劃歸新成立的調查科指揮，並在香港設立華南區辦事處和調查科香港交通站，前者由華南區指導員王華生指揮，後者由邱清猗負責（邱氏另有化名蘇子樵、李蘇雲）。華南區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觀察敵對政黨在香港的活動。¹¹ 香港站人員當時只有數人，負責把文件和書信送到上海站再轉往南京。翌年，華南區辦事處在香港成立秘密電臺，由王華生領導兩名報務員與南京聯絡。中央控制廣東省後，從香港抽調人員到粵建立黨部，直至1937年春才調回香港，香港的電臺亦歸廣東省黨部指揮。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派陳素出任香港黨務特派員，負責黨務和情報工作，剛更換更大功率（50w）無線電機的電臺亦歸其指揮。

1937年8月，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南京於12月淪陷後，國府重整其情報機構。1938年，國民黨中央把調查科升格為調查統計局，局長為朱家驊、副局長為徐恩曾，並改組其情報網絡。同年4月，為加強國民黨在南洋和海外的黨務，已遷往重慶的中央黨部成立海外部（部長陳樹人，1939年11月後吳鐵城兼任），並在九龍、澳門以及廣州灣建立黨支部。當時，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務情報工作規模仍然極小，香港支部的經費初期只有每月國幣數百元，至約一年後歐洲開戰時僑務處和黨部每月的經費增至3,000元港幣，但仍然不敷使用，需要向海外黨代表和商人籌措。¹² 1939年5月，港澳總支部成立，以吳鐵城為總支部主任委員，執行委員包括陳素等粵港黨務工作的舊人。¹³ 金以林認為吳鐵城與朱家驊爭奪在香港黨務的影響力，前者不甘於擔任總支部主任委員，希望成為國民政府在港代表，朱家驊則希望透過安插親信高廷梓在總支部擔任書記長，以加強其影響力。中統在港澳總支部設有調查統計室（下稱調統室），名義上屬總支部，實際上向中統負責，並由朱家驊派的陳積中負責（1939年7月到任）。¹⁴ 中統屬下的交通處運輸科則負責各交通站。有鑑於香港在中外交通、南洋以及華僑方面的重要性，運輸科遂在香港成立華南中心站，統轄華南沿岸的所有分站，又派周信章（化名周

¹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收入姬田光義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65。

¹²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頁85；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151-152。

¹³ 李盈慧，〈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頁71-72。

¹⁴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頁92。

雍能)為站長，邱清猗為副手。¹⁵ 可是，周、邱二人均為在港舊人，屬吳鐵城派系，可見即使朱家驊派陳積中出掌調統室，在人事上雙方仍屬合作關係。¹⁶

1939至1941年間，在港國民黨的情報組織透過電臺和華南中心站與中央聯絡。華南中心站的聯絡線為香港——廣州——漢口，漢口失守後則為香港——廣州灣——桂林——重慶。¹⁷ 南京陷落後，香港的電臺即轉而和漢口和長沙建立固定通訊。至兩地被日軍占領後，電臺則與重慶和桂林聯繫。¹⁸ 1939年4月，香港的國民黨電臺為英國殖民地當局破獲，經斡旋後英方歸還電臺。兩個月後，調統室於灣仔峽道11號設立一個15w的電臺，該地位於皇后大道東與堅尼地道兩條主要道路之間，人員容易擺脫追捕。調統室以英方交還的收發報機，再於九龍太子道158號鄰近大埔道和界限街的地點設立第二個電臺，該地屬於三合會與國民黨較為活躍的九龍市區邊緣。

1941年4月起，吳鐵城轉任中央秘書長，港澳總支部以海軍將領陳策為主任委員，他亦統領國民黨在香港的情報工作。較早時，朱家驊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雖然仍然管理中統，但無暇在香港擴大影響力，其派系人員亦逐漸他調。7月，調統室主任陳積中離職，由原中統京滬區區長沈哲臣接手，他剛在上海從汪政權情報機關獲釋，不能再於華中行動，遂被調到華南。高廷梓亦於11月辭職離港。至開戰前，中統在港情報機構由駐港特派員陳素實際領導，其屬下有調統室主任沈哲臣、兩個電臺（一個備用）、香港交通站，以及外勤組，其活動仍主要是監視國民黨的對手。正如李盈慧指出，港澳總支部的工作主要以團結海外華人抗日與發展黨務為主，而且殖民政府至開戰前夕才容許國民黨情報機關更大的自由度，因此中統戰前在港情報工作成效有限。¹⁹

與中統相比，自1938年開始在港活動的軍統雖然存在時間較短，但其組織、人事相對統一嚴密，而且領導、目標明確，因此在情報工作方面似較中統更有效

¹⁵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53。

¹⁶ 李盈慧對金以林的說法表示質疑，見李盈慧，〈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頁71-72。

¹⁷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55。

¹⁸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53。

¹⁹ 李盈慧，〈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頁75-81。

率。至日軍進攻香港前，軍統在港工作由王新衡負責，屬下有內勤組、外勤組、跟蹤隊、行動組，以及反間組，內勤人員全部來自黃埔軍校、中央軍官學校、中央政治學校，或中央警察學校等，大多為復興社社員，訓練較中統人員為佳。例如，國民黨內奸向日軍告密，內勤組人員對情報來源嚴守秘密、嚴格執行單線領導，不斷轉換地址，而且一切聯絡由交通組負責，因此日軍即使從內奸處得知其組織概況，亦未能獲得例如活動地址等具體內情。據線人情報可知，戰前軍統在港人員來自六大群體，包括「上海幫」、「湖南幫」、「四川幫」、「廣東幫」、「瓊州幫」，以及「客家幫」。軍統在香港的主要工作與中統一樣，是刺探中共和其他中國的政治勢力在港活動。²⁰ 至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前，在港國民黨人員由於與英方合作，活動逐漸公開，調統室遷往鄰近駐港英軍司令部的中環亞細亞行，原本在灣仔的電臺亦於開戰前遷往中環亞細亞行運作。此外，軍統派出監聽人員組成第8工作隊，進駐美利兵房（Murray Barracks）監聽日軍航空通訊，並探聽到日本海軍航空隊從三灶島派機空襲香港。²¹

叁、日軍占領香港後的防務與情報工作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軍在馬來亞哥打峇魯（Kota Bharu）登陸；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海軍派機空襲夏威夷珍珠港。日軍第23軍亦於數小時後越過深圳河南下入侵香港。駐港英軍早於12月5日已從泰國方面獲得日軍入侵的消息而有所戒備，但由於兵力與裝備不足，亦只能於12月25日投降。香港戰役期間，國民政府人員成立聯合辦事處支援英軍作戰，最重要的行動為成立「忠義救國軍」協助消滅以幫會成員組成的日軍第五縱隊，並維持後方秩序。²² 在香港守軍投降前，守將莫德庇少將（Maj. Gen. Christopher Maltby）通知陳策，後者根

²⁰ 「駐港重慶側高級特務機關の概略」，〈昭和17年「陸軍省大日記 第9号 2/3」〉，〈陸軍省大日記〉，《陸軍省大日記》，国立公文書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以下簡稱 JACAR），檔號：C01000135900。

²¹ 張需芝，《戴笠與抗戰》，頁129。

²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2年1月2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檔號：特21 1.167，頁1。

據原定計畫利用皇家海軍提供的魚雷快艇，連同部分英軍人員一同逃出香港。由於日軍不知有此計畫，加上負責進攻香港的第二遣支艦隊兵力薄弱，因此陳策一行順利逃出。²³

早於日軍占領香港前，日本軍方即打算將之變成日本在華南地區的軍事後勤重鎮，並計劃疏散香港的「剩餘」人口，只剩下可以協助香港成為日本軍事基地的人員。正如1943年美國海軍學院的一篇論文寫道：「（占領香港後）日本人沒有浪費時間，就決定窮盡香港的戰略價值。除了造船和維修設施外，他們把香港定位為日本本土與在南太平洋正在建立的廣大帝國之間的聯絡系統的一個關鍵環節。」²⁴ 當時，香港是西太平洋少數擁有造船與現代醫療設施的城市；單是1940至1941年間，黃埔和太古船塢已為英國政府交通部建造10艘7,000多噸的標準貨輪（稱為「帝國船」*Empire Ships*），它們和位於金鐘的皇家海軍船塢均可以維修巡洋艦尺寸的大型軍艦。²⁵ 除了造船和海港設備外，香港在當時擁有17間公私營醫院以及大量藥品和儀器。日軍占領香港後，即把絕大部分醫院充作軍用。在戰爭期間，大量日軍傷兵在香港治療或休息。戰爭期間，盟軍即掌握大量關於日軍使用香港港口和醫療設施的情報。²⁶

占領香港後，負責進攻香港的第38師團轉往參加進攻荷屬東印度的行動。第23軍以補充兵組成「香港守備隊」，兵力有3個步兵營和1個只能使用英軍火炮的砲兵營，人數共約3,000人，比一個日軍步兵團要弱。在香港和南中國海活動的日本海軍部隊為第二遣支艦隊，其司令部設於香港。該艦隊統領臺灣至海南島、呂宋北部水域的所有日本海軍，香港及鄰近水域則由「香港海軍根據地部隊」負責。第二遣支艦隊負責水域極大，但兵力只有數艘水雷艇、砲艦，以及數十艘各

²³ 詳見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²⁴ James Eyre, Jr., "Hongkong-British Naval Station and Imperial Outpost,"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gazine*, 70/3/493 (March 1944), p. 303.

²⁵ 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the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s Example, 1942-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9:1 (January 2015), p. 527.

²⁶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頁277-281。

式巡邏船隻，兵力連同海軍陸戰隊在1943年只有約3,300人。²⁷ 由於日本海軍需要在太平洋地區集中兵力，而且戰前日本海軍把資源集中建設大型艦隻，因此日本海軍缺乏近岸作戰或可以執行護航任務的小型艦艇，加上日軍在華南海空兵力薄弱，令日軍難以長期嚴密控制海岸線，更只能扶植地方水上武裝以加強對海岸和離島的控制。²⁸ 香港海岸線長達1,178公里，擁有大量小海灘和離島。對走私者、游擊隊、情報人員而言，他們可以利用海岸線進出香港或匿藏；海岸線對日本占領軍卻造成不少困擾。

1941年12月25日至1942年2月15日，香港由第23軍建立的香港軍政廳控制。由於海陸軍爭奪香港控制權，東京最後決定成立香港總督部，以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總督。此前，軍政廳已開始建立情報機構，主要由第23軍憲兵隊和直屬日本陸軍憲兵司令部的南支憲兵隊負責。總督部建立後，香港憲兵隊成立，其骨幹由第23軍憲兵隊和南支憲兵隊人員組成，在1942年初只有約120名日軍憲兵，其中軍官7人，並有約1,000多名華籍和印籍「憲查」協助執行任務。這些憲查絕大部分均為香港警察，並不完全可靠。至戰爭後期，日軍在香港、廣東省，以及臺灣招募新憲查，人數逐漸增至約3,000人（1945年8月）。日軍憲兵和憲查礙於數量不足，其控制範圍主要是在香港和九龍的市區，在新界只能把人手集中於墟市，在西貢等偏遠地區的控制並不嚴密。至於以尖沙咀為根據地的水上憲兵隊，其主要負責範圍是維多利亞港和鄰近離島，亦難以全面控制香港的海岸線。日本海軍在香港並無自己的情報機構，在華南的情報工作則由駐廣州海軍武官負責，其主要工作是收編華南的水上武裝以及收集廣州和澳門方面的情報，少有參與香港境內反間諜工作。²⁹

由於香港奉行「憲警一元」的制度，並無設立文人政府管理的警隊，因此日軍憲兵在香港任務極為廣泛。根據1942年2月20日頒布的「1942年香督指第1號」，香港憲兵隊的任務包括：保護軍事機密、掩護軍事行動和軍事設施、遏止敵人及不法分子的諜報、宣傳，以及謀略、收集治安情報、監管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管區所有「出入境、軍需品以外的物資出入、居住、企業、營運和其他商

²⁷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247-263。

²⁸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34-335。

²⁹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85-90。

業行為」、監管並檢查「出版、集會、結社等群眾運動、槍械、火藥、爆炸品、郵政、通訊、無線電、電臺、攝影等和影響軍事及治安的活動」、處理對外（和中立國人有關的）警察事務，以及管理軍人及軍屬（為軍隊工作的平民）的紀律並監視日人中的可疑分子。³⁰除了街上巡邏的憲查外，憲兵隊另設特高班，有日、華、印籍密探，負責潛伏於各公私機構和重要設施等，以反制盟軍滲透。至1943年，單是香港島憲兵隊屬下的西憲兵隊即有52名密探，其中17人於固定地點以其他身分潛伏，其餘則於市區活動。³¹

肆、淪陷初期國民黨在港情報網的恢復

香港淪陷時，日軍憲兵四出搜捕在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人員，但國府重要情報人員大多順利逃出香港。除陳策一行外，調統室主任委員沈哲臣、華南中心站站長周雍能、軍統在港負責人王新衡等亦經澳門回到內地。³²調統室工作暫時由代理主任朱關泉負責，但由於各部門忙於轉移並轉入地下，情報工作亦暫時停頓。至1942年1月中，中統才從駐澳門的周雍能收到有關香港情況的報告。³³朱關泉亦於5月離港，把工作交給時任中統交通處運輸科香港站長的邱清猗負責。其時，香港只剩下11名黨員於香港擔任情報工作。至1942年6月，港澳總支部在桂林恢復辦公，調統室於翌月轉往離香港較近的韶關。同年12月，港澳總支部委任邱清猗為香港黨務辦事處特派員，辦事處位於鄰近日軍憲兵司令部的中環雪廠街。該處自1937年已是國民黨在港活動中心，何以日軍占港後仍以此地辦公，頗令人費解。³⁴

淪陷初期，國民黨在港情報機構為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中統交通

³⁰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86-87。

³¹ 姬田光義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9。

³² 「周雍能致吳鐵城電」（1942年1月1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68，頁1。

³³ 「周雍能致吳鐵城電」（1942年1月12日），頁1；李盈慧，〈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頁83-84。

³⁴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68-169、174。

處運輸科香港站及其電臺（日軍未有發現軍統設立的電臺）。可是，有關1942年2月至1943年3月間中統在港組織和活動的電文，現在已大部分佚失，只餘下日本憲兵搜查香港站時記錄下來的電報撮要。根據日憲兵的審訊紀錄，調統室香港站分為調查組和交通組，分別由袁洪範（化名吳行、張力行）和梁國英（化名何明）負責。邱清猗和袁洪範與同樂別墅工人會的主席黃耀和副主席蕭興合作，利用水客和進出香港的熟人建立了兩條交通線，陸路為香港——惠州——韶關——衡陽——貴陽——重慶，海路則為香港——廣州灣——桂林——貴陽——重慶。³⁵ 黃耀和蕭興亦經常往返惠州和香港，為交通組傳遞文件。³⁶ 為確保遞送的文件內容不被日軍發現，在港情報人員利用中藥五倍子以水稀釋製成隱形墨水，寫在白紙上，待乾透後在其上以鉛筆或其他顏色的墨水寫上無關的內容。³⁷ 1942年2月，中統命令當時仍在香港的財政部、資源委員會駐港技術員徐安林製造兩台電報機，完成後於4月在中環半山的英輝台7號唐樓頂層重新設立電臺。英輝台7號位於中半山，鄰近堅道，屬於中區較為僻靜的地段。其時報務員仍為高聞天。電臺功率不大，只能和澳門聯繫。³⁸ 由於日軍在香港島和九龍所有碼頭均設有嚴密檢查，故此香港站主要利用陸路和電臺與重慶聯絡。當時，中統、軍統和中共港九大隊均使用不同的交通線，各方少有合作。

邱清猗從憲兵部取得許可證後，於1942年8月20日在彌敦道693號（時稱香取通）地下成立上海罐頭公司為掩護機構，以邱氏為經理，並於當日重新發訊，報告關於香港市況蕭條和日軍強迫市民使用軍票等情況。³⁹ 邱氏的居所位於九龍塘金巴倫道51號，屬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容易進入日軍兵力薄弱的新界以及九龍城寨。由於日軍迫令所有無業者離開香港，情報員均以店員身分作掩護。備用收發報機則收藏於佐敦柯士甸道108號，距離上海罐頭公司近兩公里。至1943年3月，中統召回高聞天，臨行前高氏拆卸英輝台的收發報機，使用柯士甸道的收發報機在旺角（時稱大角區）洗衣街177號情報人員孫伯年的寓所重新設立電臺。

³⁵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59。

³⁶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56-157。

³⁷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62。

³⁸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30-38。

³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34；「港敵虐待我僑胞慘酷情形」（1942年8月20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63，頁2。

洗衣街177號距離上海罐頭公司只有數街之隔。電臺運作至4月22日日軍破獲電臺為止。在此期間，邱清猗負責草擬所有發往澳門的電文，並翻譯來自澳門的密電，其後由其弟邱正倫接手。⁴⁰ 香港電臺所用的密碼為中統使用的「龍虎精神」碼，並以《唐詩三百首》中杜甫〈閣夜〉的文字加密。⁴¹ 電臺每日與澳門至少通訊一次，自1942年5月至1943年4月22日為止，香港電臺共發出電文約100封，收訊約300次。

在淪陷期間領導香港站的邱清猗在1908年於福建出生，192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政治系後，即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武漢行營偵緝處。1933年，他被派到香港，以武漢日報社駐港記者為掩護進行情報工作，至1938年任調統局華南中心站設計委員，至1942年任香港站長。⁴² 報務員高聞天在上海南洋無線電養成所畢業後，1939年於中統桂林電臺工作，1941年7月到港擔任報務員。接手的孫伯年早於1928年在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無線電報人員養成所畢業，1939年到港在國民日報社工作。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才被高聞天吸收到中統。邱正倫（化名黃志雄）則於1941年在兄長安排下到港讀書，1942年才學習電報和密碼，同年10月接手成為密碼員。⁴³ 在工作進行之初，邱清猗擁有的資源極為有限，每月經費只有港幣1,000元，至1943年陸續增加至15,000元。⁴⁴

根據日軍整理出的名單，當時仍在香港的情報人員部分已在港活動數年，亦有新吸納的人員。邱清猗屬下數名特別調查員，均為國民黨元老或文教體育方面的人物。他們直接向邱氏提供消息，其內容主要是關於政局與日本政策等，少有和軍事行動相關的情報（表1）。

⁴⁰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31、47-48。

⁴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96-197。

⁴²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221。

⁴³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47。

⁴⁴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56、91。

表1、日本審訊紀錄記載的中統在港特別調查員（內文節錄）

姓名	背景	提供情報
陳季博	1904年加入同盟會，參與黃花崗戰役，曾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0年代任國民黨駐東京特派員，與孫科、吳鐵城等國民黨高層關係密切，又由於其妻為日人，因此亦與日方關係良好。 ⁴⁵	日本對重慶政府策略 和平運動動向 日本總督部在港方針 親日華人和南京政府人物動靜
羅四維	1925年於慶應大學就學時於東京認識陳季博並加入國民黨。香港淪陷後任職總督部九龍地區事務所職員。	南京及重慶要人動靜 日本總督部在港方針 為調查統計局與楊秀瓊維持聯絡
楊秀瓊	游泳運動員，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1936年奧運，活躍於香港和南京的社交圈子。	南京政局消息 體育組織動向 親日華人活動
葉靈鳳 (葉林)	文學家，創造社成員，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後曾為《救亡日報》撰稿，其後到香港《星島日報》任職，認識在同社任職的香港站情報員蘇武（蘇泰楷）。香港淪陷後，總督部成立大同圖書印務局，聘葉氏為編輯部長。1942年受邱清猗面試後成為調查員，並於1943年成為港澳總支部香港黨務辦事處幹事。 ⁴⁶	提供大同圖書印務局出版的書籍雜誌 香港教育和文化狀況，以及香港文化團體的動向
江清白 (江澄)	香港明德中學教師，與陳季博稔熟，1941年8月經陳介紹認識朱關泉並成為調查員，淪陷後繼續工作，1943年成為港澳總支部香港黨務辦事處的幹事。	社會團體情況 中共及其他反重慶政黨動向
陳玉燕	國民黨女黨員，與陳季博同住，認識中共在港黨員，其兄為廣州政府海軍少校。	中共在港活動 廣東海軍狀況

資料來源：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92-108。

⁴⁵ 陳季博屬於國民黨右派，與謝持關係密切，香港淪陷時曾協助沈哲臣等離港，並掩護朱關泉避開日人追捕，其後協助邱清猗重建國民黨情報網絡。詳見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92-95。

⁴⁶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00-102；中統電報曾謂「葉靈鳳同志負漢奸之名留港為中宣部及中統局工作」，見「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徐恩曾」（1943年6月9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214，頁4；羅孚，〈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收入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頁308-310。

調統室調查組由袁洪範領導，控制10多名調查員。袁洪範本為中共黨員，1933年投向國民黨，被派往廣東省黨部，1939年廣州失陷到香港為陳素工作，成為華南區調查組組長。港澳總支部成立後，仍任調統室調查組組長。其職務主要為刺探中共和國民黨各派系活動、吸納黨員、觀察工人和三合會動靜，及收集關於香港社會的情報。戰前，調查組大部分時間只能秘密活動，並以個人關係擴大網絡，因此在吸收黨員方面乏善足陳。如調查員歐雲軒本為中醫，認識了求診的袁洪範，其後於1940年加入國民黨，並透過其個人網絡嘗試吸納黨員並獲得情報。另一調查員歐路文則為袁洪範的小舅。調查組能滲透到中共在港黨部和部分工會，可算尚有成效。據日軍憲兵檔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調查組共有以下成員：⁴⁷

姓名	背景
沈壽楨	廣東橡膠工會幹事
何子祥	中共香港黨部委員、印刷工會主席
方仁山	港九洋衣工會主席
李錦文	中共黨員
招見非	印刷工會委員
林 耀	玻璃工會書記
歐菁華	海員工會幹事
張 英	中英文化協會幹事
張彥良	寶安青年會幹事
歐路文	青年記者學會會員
歐雲軒	中和堂委員
楊 甦	報館工人聯誼社職員
余仲平	港九旅港青年聯誼會
黃治南	皇后戲院（後明治戲院）職員工會委員
陳昭寧	昭寧道學會主席
陳靜宜	戲院業工會委員

⁴⁷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18-132。

從日軍繳獲的往來電文顯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站送出的消息主要關於以下幾類：日軍在港施政、香港治安和經濟金融狀況、國民黨黨員在港活動和生活情況、各黨派動靜、社會團體、親日華人、汪政府人員，以及華僑動向、華人文化和體育團體的情況等。⁴⁸ 此外，調查員沈壽楨及其屬下的8名「細胞」則負責香港第二海軍工作部（位於金鐘的前皇家海軍船塢）、香港造船所（前太古船塢），以及九龍造船所（前黃埔船塢）的造船情況、組織架構，以及人員名稱等。同組亦負責刺探在中華書局印製的日軍軍票和汪政府中央儲備銀行券的數量。⁴⁹

由於負責人員的背景和經驗，1942至1943年春香港調統室對情報戰的貢獻有限。日本憲兵搜查到的來往電文顯示，中統在此期間主要要求香港調統室調查香港社會狀況、各黨派、社團動靜、國民黨員生活狀況、物價、金融問題，以及特定人物（如與汪政權有關者）等，少有要求軍事情報。⁵⁰ 其後的指令亦幾乎全部關於個別黨派，特別是中共，以及當時被視為「第三勢力」的中和黨等黨派。至1943年2月，中統才要求香港調統室提供關於造船的報告。⁵¹ 至於香港調統室向中統提交的報告，內容自然亦與香港社會狀況和黨派動靜有關，少有軍事消息。在107封調統室發給中統的電文中，只有5份和日軍軍事有關，其餘有24份關於中共活動、11份關於汪政權、12份關於其他黨派、32份關於香港社會狀況（金融、物價、市民情緒等）、20份關於內務，另有3份和日本政策相關（和平工作）。與軍事相關的電文中，只有1份提及日軍在港兵力，內容包括「市區內少有士兵」，並承認未能獲得日軍布防的具體情報。⁵² 另一份電文則關於日軍在香港打撈約80艘船隻，並建造數艘船隻，但未有提及型號和建造地點。⁵³ 至1943年4月，中統中央已頗不耐煩，提到香港調統室提供的情報「幼稚」，要求其改進。⁵⁴

⁴⁸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89-90。

⁴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31-132。

⁵⁰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285-287。

⁵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288-292。

⁵²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317。

⁵³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318。

⁵⁴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293。

與此同時，英軍在香港亦開展情報工作，其目標則為刺探軍事消息、聯絡戰俘，以及瞭解社會狀況。1942年初，香港防衛軍警官賴廉士中校與其華人助手李耀標逃到中國大陸後，提出在香港附近成立一個情報機構，負責搜集日軍情報並與戰俘取得聯繫，以進行大規模的逃亡行動。至1942年中，英方向蔣介石保證不會在華南進行政治工作，遂得到蔣的批准，成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指揮部設於惠州，並在曲江建立前線指揮部。在香港境內活動的中共港九抗日游擊隊蔡國良部向英方表示願意合作，但英軍服務團只於香港境內與其合作，而且正如前線指揮官何禮文少校（Maj. Ronald Holmes）指出，中共的游擊武裝只願意在不可能驚動日人的情況下提供協助，而這個態度「妨礙了絕大部分有用的工作」。⁵⁵ 1943年6月，英軍服務團曾與蔡國良部討論在大嶼山設立監視哨，遭到第七戰區反對而作罷。9月，英軍服務團於大鵬半島設立監視哨不久，即遭到中共劉培部扣留人員裝備，經3個月談判才得以放行。其後，英軍服務團與中共游擊隊在香港合作有限，在香港以外則無聯繫。與此同時，中統與英軍服務團在香港亦無聯絡。⁵⁶

與英軍服務團不同，在此期間國民黨在港情報人員少有刺探日本海陸軍在香港的規模及來往日軍的番號和動向，以及後勤設施的動靜或戰俘營的活動。這是因為除了數名長期與國民黨有關的情報員以外，國民黨只能吸收個別青年學生或工人加入其行列。例如，為沈壽楨調查第二海軍工作部情報的細胞歐陽順是調查統計室人員郭以成的結拜兄弟，他為了額外給養而協助沈壽楨，但他在第二海軍工作部只是一名鉗工（fitter），難以獲得重要情報。另一名在第二海軍工作部工作的細胞是曾於沈壽楨任教的東華小學就讀的羅牛。他無償為調查統計室提供情報，但他只是見習工。⁵⁷ 負責在九龍造船所提供情報的梁孝悌是沈壽楨的親戚，他在香港淪陷後才往造船所擔任臨時工。⁵⁸ 細胞李常本為西餐工會會員，被人以「中國人須要加入國民黨」為由說服入黨，負責刺探九龍工商會和其他團體的消

⁵⁵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and the Coastal Waters and Seaboard of Mirs Bay and Bias Bay,” 12/7/1944, WO 208/254,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p. 4.

⁵⁶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and the Coastal Waters and Seaboard of Mirs Bay and Bias Bay,” 12/7/1944, WO 208/254, pp. 3-6.

⁵⁷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45。

⁵⁸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47-148。

息，而他只是冰室伙計。⁵⁹ 細胞中最有潛質者為於致中學校就讀西班牙文的楊炳雄，他在淪陷期間於港務局工作，為調統局提供關於船隻出入境的情報。⁶⁰ 當時英軍服務團甫一開始即獲得仍在香港的殖民地政府華人公務員、華籍英兵，以及名流的協助。例如，英軍服務團與仍在港務局和日本海軍第二工作部（前皇家海軍船塢）工作的前香港政府人員以及被迫和擔任衛兵的前英印軍士兵取得聯絡，自1942年下半年即開始提供有關海港活動和日軍防務的資料。⁶¹ 與此相比，香港調統室人員則因為其身分而難以得到有用的軍事情報。

伍、1943年日軍對盟軍情報系統的掃蕩

1943年春，日軍密探留意到香港出現盟軍即將反攻的謠言，並發現同樂別墅工會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至3月，日憲兵隊收買同樂會別墅工人會副主席蕭興（調統局交通組人員）和會計吳江，並成功於4月8日誘捕交通組主任梁國英。兩日後，梁不堪嚴刑，供出自身職務及中統在香港的網絡。⁶² 19日，日憲兵隊認為已經掌握中統在港情報網的全貌，遂於翌日大舉出動，封鎖各出入境口岸，並由梁帶路到上海罐頭公司，逮捕正在店內的孫伯年。孫氏妻子到英輝台找邱清猗，但已被日軍密探跟蹤。雖然邱氏等人嘗試把電臺化整為零並逃走，但他及其屬下均於當晚陸續被捕。⁶³ 憲兵隊共逮捕91人，並沒收兩組收發報機和密碼書。日軍迫使孫伯年供出電臺呼號，並嘗試和澳門的中統電臺聯絡。據邱氏其後向陳素報告，日軍要邱氏譯出電文並撰寫覆電，但他「密用巧詞」，令澳門電臺起疑，後者遂中止通訊。⁶⁴

日軍逮捕各人後，並未立即審訊，而是極力折磨各人，希望獲得更多情報，

⁵⁹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40。

⁶⁰ 香港憲兵隊本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頁149-150。

⁶¹ 「審判」，見“Notes on Execution of POWs with Translation,” WO 325/167.

⁶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3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203，頁1。

⁶³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31日），頁2-3。

⁶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31日），頁4。

因此在7月審訊開始前已有10多人在獄中死去。⁶⁵ 可是雖然憲兵當局要求對各人施以「最嚴厲懲罰」，但總督部並未將所有逮捕人員殺害，而是設立一特別法庭，由總督磯谷和海陸軍軍法官組成，逐一審訊各人。據邱清猗事後報告，審訊期間，邱氏強調調統室的主要工作為反共，而且日人「無直接暴動及擾亂治安罪證」，因此應釋放調統室人員。從上文可見，香港調統局根本難以獲得有用的軍事情報，因此邱清猗的辯詞亦非全無根據。最後，日人判決邱氏交保在外，由憲兵監視其行動，羅四維、陳季博、葉靈鳳則無罪釋放。⁶⁶ 可是，除了他們以外，不少被捕的中統人員均被日軍處決（8人）或在獄中死去（21人）。⁶⁷ 1943年10月，惠陽派人到港詢問邱清猗情況，其時中統在香港的情報網絡已經崩潰，英軍服務團在港工作亦因為被日軍發現而大受打擊，只有港九大隊因少有參與情報蒐集工作而沒有受到太大影響。⁶⁸

正當國民黨在香港的地下網絡幾乎被連根拔起時，國民黨在粵東的勢力亦日漸萎縮。英軍服務團的何禮文於1944年中指出，中共游擊隊控制了粵東的水腳貿易，並得以逐步控制本來向國民黨效忠的地方武裝。1943年初，原本在東江地區的國軍第187師被獨立第9旅取代，何禮文認為該部素質甚劣，使東江地區的中共地方武裝得以持續擴張。另外，日軍於1943年11月打通了九廣鐵路並占領沿路地段，但其後只留下少數兵力駐守，何氏直言此舉「促進了紅色勢力擴張」，因為他們「毋須面對中央政府軍的攻擊」。⁶⁹ 至該年底，海岸地區（鄰近香港者，即大亞灣和大鵬灣）已經落入中共游擊隊手中，何氏指「政府軍不敢進入該區，除非該部兵力有一營以上。」⁷⁰ 這些發展，均使身在香港的國民黨黨政和情報人員

⁶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31日），頁5；「轉請撫恤李惠馥等廿八人等」（1944年4月），《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29，頁2-3。

⁶⁶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31日），頁5。

⁶⁷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91。

⁶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3年10月24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205，頁2-3；至於英軍服務團被破獲的情況，見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44-346。

⁶⁹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and the Coastal Waters and Seaboard of Mirs Bay and Bias Bay,” 12/7/1944, WO 208/254, pp. 2-3.

⁷⁰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and the Coastal Waters and Seaboard of Mirs Bay and Bias Bay,” p. 3.

更為孤立。

陸、戰爭後期國民黨在港軍事情報工作

1943年日軍破獲英軍服務團和中統網絡，加上盟軍開始反攻中太平洋並進窺華南沿岸，在港活動的地下抵抗組織均嘗試調整策略。同年11月，港澳總支部派沈哲臣到香港重整黨務以及中統的情報網。據沈氏報告，他到港後與情報黨工人員檢討工作、為情報人員提供訓練、聯絡九龍地方組織和社團、成立「戰地行動縱隊」、嘗試派員潛入日軍及合作者政權刺探情報、重建水陸交通線並重新建立電臺等。⁷¹ 從建立戰地行動縱隊一事可見，中統經1943年一役後，即模仿中共在香港的方針，除了加強在市區的情報和黨工網絡外，亦嘗試在香港建立割據一方的武裝力量一面與日軍作戰，一面與中共競爭。

沈哲臣南下後，中統至1944年4月在香港建立或再編了14個分部，共有約250名新舊黨員，並於尖沙咀和油麻地等傳統國民黨活躍地區進行下層工作，水陸交通線則有5條。⁷² 至9月，分部數量增至31個，新黨員人數再增加60人。陳素更聲稱人數將達500人，但電臺仍未設立。⁷³ 在香港建立武裝力量的嘗試則成效有限。1944年年中，港九支部聲稱招攬到正為日本海軍工作的莫俠，成為國軍迅速在香港建立武裝力量的最大希望。據港九支部報稱，莫俠時年32歲，來歷不詳，香港淪陷後在第二遣支隊砲艦須磨艦長旭龍雄少佐介紹下為日本海軍第二工作部工作，其後負責香港西面海域的治安和緝私工作。他在香港和澳門之間的垃圾尾島、大嶼山，以及大澳均有據點。據沈哲臣報告，莫部擁有機槍10挺、長短槍300杆、機動船數艘，並有裝備有火器的船艇多艘，他控制的海域有過千艘漁船活動。⁷⁴ 莫俠不但願意在國軍反攻時趁機截擊日軍，更承諾掩護國軍在其勢力

⁷¹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92-493。

⁷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4月27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27，頁5。

⁷³ 「陳素致吳鐵城函」（1944年），《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7，頁3。

⁷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6月6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3.7，頁4。

範圍內開設電臺。⁷⁵「莫俠」之名並無在日本或其他資料中出現，而當時控制垃圾尾島者，是正與日本海軍合作，成為「廣東沿岸守備隊」司令的前國軍上校甘志遠。甘氏在其自傳中並無提及與國民黨人員聯絡，他在戰爭結束前亦未擁有成為中統控制的武裝力量。⁷⁶另一支港九支部聲稱可以運用的武裝隊伍，是由在港黨員組成的「港僑殺敵先鋒隊」，其部分人員在香港戰役期間曾協助防守香港，戰後則轉入地下。⁷⁷經一輪整理後，陳素在1944年9月提出建立兩支「殺敵先鋒隊」，一隊（許劍夷部，100人）於平海訓練，一隊（潘達文，化名李雲生部，200人）於九龍潛伏，另成立幹部訓練隊，並把莫部吸納為「香港海上挺進第一支隊」。⁷⁸

另一方面，由於駐港英軍參謀長紐臨上校（Col. Lanceray Newnham）等人因為聯絡英軍服務團計劃逃出戰俘營被處決，戰俘大多不願冒險逃走，服務團亦把工作轉移至搜集日軍活動和香港社會情況的情報，一方面協助美國陸軍航空隊第14航空隊（14th USAAF）和中美混合團（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⁷⁹攻擊香港，一方面為倫敦提供情報，例如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把香港基礎設施、糧食，以及社會狀況寫成詳細報告轉交香港計劃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以便於英軍重回香港後迅速展開重建工作。在此階段，港九大隊於1943年秋曾截劫英軍服務團的人員與器材，雙方已中斷合作。⁸⁰由於期望美

⁷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6月6日），頁5。

⁷⁶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34-335。

⁷⁷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8月2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3.6，頁3。

⁷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6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3.5，頁5。

⁷⁹ 1942年7月，美軍在華成立「中國航空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 USAAF），屬下部隊包括第11轟炸中隊（11th Bombardment Squadron，配備B-25中型轟炸機）和1941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又稱「飛虎隊」），由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指揮。自1942年7月起，該部在中國大陸支援中國對日作戰。至1943年3月，該部擴編為第14航空隊，轄下第23戰鬥機大隊（由飛虎隊改編而成，配備P-40戰鬥機）、第308轟炸機大隊（308th Bombardment Group，配備B-24型重轟炸機），以及第11轟炸中隊。1943年11月，中華民國空軍和美國陸軍航空隊人員混編的中美混合團成立，配合第14航空隊作戰。有關飛虎隊、第14航空隊和中美混合團，詳見陳納德著，陳香梅譯，《陳納德將軍與中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Martha Byrd, *Chennault: 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7)；郭冠麟編，《飛虎薪傳：中美混合團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年）。

⁸⁰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39，頁

軍登陸華南和香港，主要盤據西貢和部分新界地區的港九大隊即嘗試拉攏美方，例如禮遇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Lt. Donald Kerr）。自此，美國第14航空隊即與港九大隊建立聯繫。⁸¹

自1944年1月開始，中統的香港情報網開始再次提供情報。正如劉維開指出，這些情報大多屬於軍事情報，包括日軍和合作者部隊的往來調動、香港社會狀況，以及其它盟軍情報和地下抵抗活動的消息。可是，與前段時期相同，由於中統人員少有滲透到關鍵位置，加上他們的軍事情報訓練有限，因此提供的情報素質與英軍服務團有不少距離。例如，1944年1月的報告中，中統人員提到樟木頭附近有日軍活動，可能進犯惠陽，但未提供部隊規模以及組成、隊號等情報。⁸² 提到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中統人員亦只能大致描述新建築物的數量，但未能指出其位置。⁸³ 一份1944年3月的報告指日軍在灣仔「陸上警備隊」收藏「巷戰用小型坦克」，但未能指出灣仔「陸上警備隊」是海軍的香港根據地陸上警備隊，亦未能指出這些「小型坦克」是日本海軍型號還是日軍於1941年俘獲得來的英軍布倫載具（Bren Carrier）裝甲運兵車。⁸⁴ 盟軍得此情報，亦難以作出相關判斷。即使國軍發現日軍重要設施，其人員以至後方上層人員卻缺乏足夠軍事知識解讀。例如，1944年7月中統人員發現大帽山有「口字型巨大無線電臺」。⁸⁵ 這個「電臺」，其實是日軍雷達夕チ3号（Tachi 3），它是根據俘獲自新加坡的英軍雷達複製而成。⁸⁶ 如能破壞此雷達，將為第14航空隊攻擊香港帶來不少方便。另外，中統亦未能提供日軍高射砲陣地的位置；與之相比，英軍服務團早於1942年11月已能將其位置製成表冊，並附上手繪圖作參考，更有日軍防空

3-4。

⁸¹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47。

⁸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1月3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40，頁1。

⁸³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40，頁3-4。

⁸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3日），頁3。

⁸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7月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90，頁3-4。

⁸⁶ “Photographs of Japanese Radar Site on Tai Mo Shan”,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RS 169-2-193.

安排、日機活動情況、以及美軍轟炸實際效果等情報。⁸⁷

有關港口活動的情報亦類似。中統人員雖然發現船隻出入香港，但從無提供關於船隻的描述，反而提供不少未知出處的錯誤情報。例如，1944年3月港九支部報告日本「第2艦隊第10戰隊第9驅逐隊」屬下的3艘驅逐艦奉「南支艦隊」命到菲律賓水域進行反潛任務。可是，日軍並無南支艦隊此一番號、第2艦隊並無第10戰隊（該部主要由艦隊驅逐艦組成，負責重要艦隻如航空母艦的護航工作）、第9驅逐隊當時則屬於北東方面艦隊屬下的第5艦隊，在北太平洋活動，與香港風馬牛不相及。⁸⁸ 早於1942年底，英軍服務團被派到香港觀察船隻活動的人員經特別訓練，能準確描述進出香港的船隻外型、噸位，以及類型。⁸⁹ 例如，一封1944年7月英軍服務團發給第14航空隊的船隻報告包括如下內容：日期、來源分類（目測或其他消息來源）、船隻大小、類型、噸位、外觀、露天甲板布局（船橋位置）、停泊地點（以美軍地圖座標表示）。這個消息從香港發送至美軍以及桂林的英軍服務團總部。⁹⁰

即使發現日軍調動，中統人員不但未能準確描述其組成，有時亦只有於事發後提交不完整的報告，甚至有虛報軍情的嫌疑。例如，1944年3月港九支部報告日軍第45師團屬下的第96旅團步兵第129聯隊在平湖一帶，⁹¹ 但日軍根本沒有第

⁸⁷ “Waichow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12,” 10/11/1942, EMR-1B-01,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pp. 4-5; “Waichow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13,” 6/12/1942, EMR-1B-01,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p. 3;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66,” 15/9/1944, EMR-1B-04,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pp. 1-2.

⁸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14，頁4；「昭和18年12月1日～昭和19年5月31日 第10戰隊戰時日誌（4）」，〈戰鬥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08030050300；「昭和19年3月1日～昭和19年3月31日 第5艦隊戰時日誌AL作戰（5）」，〈戰鬥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08030019400。

⁸⁹ “Waichow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15,” 30/12/1942, EMR-1B-01,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Appendix A, pp. 1-3.

⁹⁰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61,” 11/8/1944, HKRS 211-2-28,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p. 1.

⁹¹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14，頁3。

45師團，⁹² 而步兵第129聯隊隸屬第42師團，1944年2月於仙台編成，其後即一直擔任千島守備隊至1945年7月再被調到北海道，沒有赴海外作戰。⁹³ 日軍分別有「第96旅團」和「混成獨立第96旅團」，前者於1945年2月在廣東曲江編成，後者也是成軍於1945年2月，隸屬於本土決戰的「東京灣兵團」。耐人尋味的是，兩者均成軍於中統報告該部隊存在約一年之後。⁹⁴ 同月日軍掃蕩港九鐵路線的游擊隊後，中統於事後才報告其情況，但亦未能提供具體結果。⁹⁵ 另一方面，中統對日偽部隊或長駐香港、深圳地區的日軍的動向則有較好掌握。例如1944年5月港九支部報告廣東綏靖公署的部隊接管部分新界北區，並能指出其番號。⁹⁶

部分港九支部報告的所謂破壞活動，其效力亦頗成疑問。1944年3月，港九支部報告日軍為趕修橫瀝至石龍的鐵路，在香港招攬2,000伐木工人以製作鐵路枕木，但工人傷病眾多，中統特工乘機散播謠言指「山神降臨」，使「修者不敢往」。⁹⁷ 1944年4月18日晚，日軍位於西貢道鄰近啟德機場的哨站被襲擊，日軍方面紀錄指哨站被中共游擊隊襲擊，但港九支部在5月2日則經陳素向中統報告該襲擊為「我游擊隊」負責，但未說明何部隊以及誰人率領，亦欠缺具體內容。港九支部聲稱此役殺敵3名，繳得12桿步槍。⁹⁸ 啟德機場當時的空中兵力為第254海

⁹² 「第1～第44師團」，〈主要部隊略歷表（師團の部 昭和20年8月15日現在）〉，《陸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12121057100；「第46～第66師團」，〈主要部隊略歷表（師團の部 昭和20年8月15日現在）〉，《陸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12121057200。

⁹³ 「步兵第一二九聯隊略歷」，〈陸軍北方部隊略歷〉，《陸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12122431700。

⁹⁴ 「第131師團步兵第96旅團歷史」，〈步兵第96旅團歷史〉，《陸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13070494800；「東京灣兵團（通稱号房部隊）」，〈陸軍部隊（主として内地）調査表 昭和20年8月15日現在〉，《陸軍一般史料》，JACAR，檔號：C12121072500。

⁹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14，頁1。

⁹⁶ 「吳鐵城致何應欽函」（1944年5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08，頁2。

⁹⁷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36，頁2。

⁹⁸ 「昭和19年4月1日～昭和20年1月23日 第2遣支艦隊戰時日誌戰鬥詳報(1)」（1944年4月），〈戰聞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Ref: C08030032800，頁11；「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5月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軍航空隊香港派遣隊（使用零式戰鬥機），但該隊作戰紀錄顯示4月的任務並無受到影響。⁹⁹ 中統特務亦曾嘗試在盟軍進行夜間空襲時發射照明彈或火矢標示目標。可是，正如陳素在報告中指出，港九支部此舉既未知會第14航空隊，亦未知其意見如何。¹⁰⁰ 即使盟軍進行夜間空襲而有國軍利用火矢標示，其成效亦有限。例如，1944年9月1日晚第14航空隊派出B-25轟炸機12架空襲啟德機場，港九支部聲稱自己的火矢「收效頗大」，但實際上美軍的行動未能擊中機場，日軍亦未有任何損失。¹⁰¹ 其實，當時美軍攻擊香港主要以兩個形式進行，即大編隊日間水平轟炸和小隊飛機（1至3架）突襲維多利亞港和香港水域的船隻。兩種攻擊均非於夜間進行。另一破壞活動報告的內容亦頗為耐人尋味。1944年10月16日第14航空隊為支援美軍登陸菲律賓，大舉空襲九龍船塢，中統在港人員事後要求獎勵，聲稱他們在空襲期間乘亂把炸藥放進附近的防空洞，美軍的炸彈爆炸時其震動引發炸藥爆炸，燒燬日軍儲存在洞內的電油。¹⁰² 日軍報告通常清楚列出損失，包括電油，但此次空襲英日雙方都無提到有電油損失。¹⁰³

中統特務在香港獲得的情報中，較為準確者大多關於香港社會情況。例如情報多次提到香港出現糧荒、香港經濟狀況、文化團體活動，以及總督部的臨時措施等。例如，1944年4月港九支部報告總督部禁止技術工人離港並招攬技工回港工作，並於7月報告香港渡輪因缺乏燃料而停駛。¹⁰⁴ 1944年9月，港九支部報告

1.104，頁1。

⁹⁹ 「第254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戰鬪詳報 香港·台灣·比島·7地派遣隊·台灣方面作戰」（1944年4月），〈戰鬪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Ref: C13120304000。

¹⁰⁰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10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0，頁4。

¹⁰¹ 「昭和19年4月1日～昭和20年1月23日 第2遣支艦隊戰時日誌戰鬥詳報」（1944年9月），〈戰鬪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Ref: C08030033000，頁6。

¹⁰²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1月4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59，頁3。

¹⁰³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72,” 27/10/1944, ERC, EMR-1B-04, HKMP；「香督參電367號」（1943年11月2日），〈第23軍（附·香港總督部）發電綴 昭和17年1月～19年12月〉，〈重要電報〉，《陸軍一般史料》，JACAR，Ref: C12122334500，頁29-30。

¹⁰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4月1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20，頁1；「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7月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總督部成立「香港機帆船營運團」，顯示日軍海運已達山窮水盡的境地。¹⁰⁵ 可是，這些情報大多自報紙等公開渠道獲得，其價值有限。另一較有效果的工作，則是潛入各機構刺探關於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情報。例如，1944年7月中統特工成功滲透到日軍新成立的檢查廳，該部負責在各總督部部門進行針對中立國人和華人的反間諜工作。¹⁰⁶ 另外，中統對英軍服務團的動向亦較有掌握，這是因為服務團總部鄰近港澳總支部，而且至少有1名中統人員滲透到服務團之中。例如，港九支部於1944年9月24日報告英軍服務團正積極聯絡從香港逃出的印裔警察。¹⁰⁷ 兩日前英軍服務團才向身在重慶的英國駐華武官提及此事。¹⁰⁸

至1944年下半年，中統在香港的軍事情報工作質量才漸有改進，其原因可能是英軍服務團中的中統特工偷取服務團的情報。1944年9月的一份情報中，港九支部終於正確提供駐紮九廣鐵路的日軍部隊的代號（即波8114和8124 [應為8142] 部隊）但仍未能提供其實際隊號（香港防衛隊屬下的獨立步兵第67大隊和獨立步兵第13旅團第240大隊）或規模。¹⁰⁹ 同月，港九支部亦能發現日軍正經香港增兵至粵省，但未能發現這些部隊的番號、規模，以及目的地。¹¹⁰ 其實，這些部隊將開往梧州，執行日軍所稱的「西江水路開通作戰」。¹¹¹ 10月，中統報告日軍放棄擴張啟德機場的計畫，並發現機場有數架木製假飛機以吸引盟軍轟炸。¹¹² 由此可

1.90，頁4；“Information Section Report No. 83 Dated 13 October 1944,” TNA, WO 208/3035.

¹⁰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6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4，頁3；“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67,” 22/9/1944, ERC, EMR-1B-04, HKMP；〈香港軍政日誌〉，《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第1卷第5號（1944年10月），頁28-29。

¹⁰⁶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7月2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87，頁1。

¹⁰⁷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24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73，頁1。

¹⁰⁸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67,” 22/9/1944, ERC, EMR-1B-04, HKMP.

¹⁰⁹ 「目次『南支那方面部隊略歷』」（1961年12月1日），〈南支那方面部隊略歷〉，《陸軍一般史料》，JACAR, Ref: C1212244900；「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12，頁4。

¹¹⁰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17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70，頁3。

¹¹¹ 「昭和19年4月1日～昭和20年1月23日 第2遣支艦隊戰時日誌」（1944年10月），〈戰闘詳報 戰時日誌〉，《海軍一般史料》，JACAR, Ref: C08030033100，頁5。

¹¹² 「沈哲臣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29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見，港九支部的情報能力雖然進展緩慢，但亦非毫無寸進，終究距離提供重要的戰略情報尚遠。

1944年5月，在英軍服務團中潛伏的中統特工歐菁華向中統方面描述英、國、共三方的情報工作。他指出當時日軍認為英軍服務團是其最大威脅，亦是其主要防備對象。可是，由於英軍服務團電臺被破獲，加上與國共雙方均中斷合作，交通頗感困難，情報暫時只能以人力送出。另一方面，中共則於粵東和新界西貢擁有游擊隊，加上日軍並不視之為主要威脅，因此擁有較強的實力（歐氏聲稱中共有「2,000武裝人員於港九區內」）和牢固的據點（西貢及東江地區），並能在香港散播反日和反國民黨的宣傳。¹¹³ 日軍最注意者是香港作為海港和後勤基地的功能，港九大隊在西貢活動，極少以武裝部隊進襲，對日軍實際影響有限，加上駐港日軍兵力不足，因此解釋了何以日軍對中共游擊隊漠不關心。可是，相比之下，中統在情報方面不及英軍服務團，又欠缺中共在香港和粵東擁有的游擊勢力。缺乏本地力量亦使他們失去和英美軍合作的機會。例如，1944年2月美軍克爾中尉座機在新界上空跳傘，逃到中共港九大隊控制的西貢區。中統港九支部發現此事並將之報告，但未能援助克爾，使港九大隊得以利用此事向美軍輸誠。¹¹⁴ 港九支部在軍事情報工作的表現乏善可陳，使吳鐵城在1944年5月亦不禁抱怨：「中共分子何以能在敵後不斷活動而未見我方同志工作表現，希特加注意為盼。」¹¹⁵ 6月，吳鐵城再電陳素，囑其「切實開展敵後工作」，可見中央對港區工作的不滿。¹¹⁶

為此，陳素回報吳鐵城，指出中共在粵港的游擊隊力量強大，其西區游擊隊以截收水腳為主，香港邊區則有強大的游擊兵力，只能以正規軍應付，更需要至

1.69，頁3-4。

¹¹³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5月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31，頁6。

¹¹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2月2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40，頁3。

¹¹⁵ 「吳鐵城致陳素電」（1944年5月1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31，頁3。亦見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94。

¹¹⁶ 「吳鐵城致陳素電」（1944年6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30，頁1。

少1旅或1師兵力，並要加強惠陽等地的黨務工作。他亦嘗試辯解：「本部以前側重港九等地工作，對邊區方面雖非本部工作重要對象，亦仍列於黨派工作之重要對象」。他又再次強調「香港敵兵亦僅注意本黨及英軍服務團工作」，對「奸偽在港活動則並不關心」。¹¹⁷ 不過，他亦承諾與該地黨政軍機關合作打擊中共活動。由此對話中，亦可看出中央對香港和粵省沿岸的情況瞭解有限，而且對港區工作未訂下具體重點，只是一味要求港區人員擴大任務範圍，並與中共競爭。這顯然是因為當時國共雙方仍假設盟軍將會反攻廣東省沿岸，因此希望擴大在該地的工作以便於盟軍上岸時得到更多援助。¹¹⁸ 可是，正如英軍服務團的情報指出，中統在粵東地區的地方武裝實力極為有限，而且當地向國民政府效忠的地方武裝又不可靠，加上戰區司令余漢謀對此事興趣不大，因此清剿中共武裝的工作根本無從談起。¹¹⁹

相對於中統，軍統在日據香港的情事情報工作有明確的目標，而且由曾接受相關訓練者負責。1943年7月，軍統和美軍合作在重慶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其中一項工作，即於沿海地區建立氣象站、監視哨（coast watch），以及電臺，向中美航空隊報告日本船隻以及軍艦的行蹤，方便進行攻擊。其時，軍統在香港的監視哨和電臺負責為中美航空隊提供港口活動情報。¹²⁰ 在此期間，中統、軍統人員在香港各自工作，此舉雖可被看成「各自為政」，但從保密角度而言卻更為理想；由於中統人員大多訓練不足，如雙方聯絡太多，反而可能連帶使日軍得以發現軍統在香港的間諜網。有見於香港中統電臺被捕，戴笠特別指示包括香港等各地軍統電臺「須用化名，不得用地名」，並要求屬下商討「電務人員之訓練、特殊地區電機之偽裝、構造之改良、電臺密本之取消、交通技術之改進、電臺地址之掩護」等。¹²¹ 可是，從現有資料看，即使軍統在香港的監視哨亦未有發揮太大作用。1945年1月，日軍進擊西南地區甚急之時，戴笠直言：「在

¹¹⁷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6月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30，頁4。

¹¹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6月3日），頁3。

¹¹⁹ “JIC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44) 19 (o),” 18/1/1944, WO 208/254, p. 1.

¹²⁰ 張霽芝，《戴笠與抗戰》，頁347、354、361；胡元度，〈香港情報英烈錄〉，《中外雜誌》，第38卷第6號（1985年8月），頁94-95。

¹²¹ 古僧，《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臺北：博學出版社，1978年），頁204-205。

廈門與香港活動之敵艦全人不能加速情報通知14航空隊予以轟炸，均屬全人工作重大失誤。」¹²²

1944年10月，美軍反攻菲律賓，其艦隊活躍於南中國海，中統亦嘗試加強在港工作，以於盟軍進攻香港或日軍投降時發揮更大作用。該月，中統港九督導區和港九支部特派員辦事處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增加淡水和平海（分別距離香港約50和70公里）工作站、建立兩地和香港之間的情報網和水陸交通線、加強與偽軍聯絡和策反工作、調查英軍服務團內幕以及該部和中共游擊隊的合作、建立電臺（自年初以來尚未進行）、加緊訓練殺敵先鋒隊，以及加強搜集中共和偽軍的情報。¹²³ 淡水和平海就近大鵬灣和大亞灣，是盟軍反攻香港的兩個主要登陸地點，亦是日軍主要抵抗盟軍登陸防線的所在地。¹²⁴ 中統特意要求加強對英軍、中共，以及偽軍的情報工作，似乎與其政策有關。當時，國民政府一直向英美要求收回香港，或至少九龍和新界，中統自然希望加強在該地的黨務和情報機構，以及建立武裝部隊，以便遂行其政策。

可是，當時中統在香港的人員、實力，以及情報能力仍然非常有限。至11月，港九支部分部增至36個（港11個、九25個），但實際上只有黨員138人，與前報告相距頗遠。¹²⁵ 可是，陳素聲稱在九龍的75名黨員中「每人均有發展對象二三人」，而且「本月份即可登記入黨」。¹²⁶ 這個說法和數月前的兩次報告類似。他又聲稱「除黨的基層組織外，其他武裝力量除莫、李兩部（上述莫俠和李雲生部）現有人槍八百餘支，鋼砲機關槍三十挺外，其分散於憲查隊及各社會階層中為我同志直接領導及運用者三百餘人，並有長短槍五十餘支。」¹²⁷ 中統在港雖可滲透到部分日軍在港機構，但並無實質武裝力量，只有自來投靠的「莫俠」

¹²² 「戴笠手令」（1945年1月10日），〈戴公遺墨——一般指示類〉，《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4400000049A。

¹²³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9月30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6，頁3。

¹²⁴ 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the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p. 555.

¹²⁵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1月10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54，頁1-2。

¹²⁶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1月10日），頁3。

¹²⁷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1月10日），頁3。

和李雲生部（另外由在港黨員組成的許劍夷部則被軍委會命令解散，人員繼續潛伏），其是否可靠則屬疑問。至於所謂潛伏於社會的數百名人員，不但數目和來歷不清，更缺乏清晰的領導和組織，難以指望他們在關鍵時刻能有所作為。

在盟軍接近華南沿岸前，中國大陸的情況出現變化，使英、國、共三方在香港的工作均受影響。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春，日軍摧毀了國軍在廣東省的地位並使中統更難擴大它在香港的活動。另一方面，並非日軍主要目標的東江縱隊則乘機擴展勢力。例如，東江縱隊於1944年7月占領惠州和東莞之間的橋頭，解散該地由第七戰區控制的地方武裝並開始徵稅。¹²⁸ 東縱亦於年底占領了平海地區的鹽場，並以此額外財源增加軍火和加強反國民黨的宣傳活動。¹²⁹ 至12月，港九總支部回覆中央關於對付中共在香港和廣東的游擊隊的指令，一方面指粵省黨政軍機構不允許該部參與對抗東江縱隊，一方面對自身在香港為何未能與港九大隊抗衡又語焉不詳。¹³⁰ 翌月，日軍進犯港澳總支部的所在地惠陽。15日至16日，博羅、惠陽、惠州城相繼失陷，港澳總支部的人員徒步緊急撤退到橫沙（位於惠陽東北），最後退到河源（惠陽以北約100公里）。¹³¹ 即使戰爭即將結束，在粵日軍仍然對港澳總支部構成不少麻煩；1945年5月，日軍再陷河源，迫使港澳總支部再次轉移。¹³²

至1945年中，在粵日軍集中兵力於廣州、香港，以及大亞灣和大鵬灣一帶，準備最後決戰。其時，日軍把惠州和東江地區的控制範圍交給地方武裝，將它們組織為「護國軍」。¹³³ 中統則嘗試與這些部隊聯絡，以便於反攻粵港地區時獲得支援。可是，部分偽軍首領懼於國民政府清算，不願加入。例如，汕尾偽軍首領

¹²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4年7月2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85，頁2。

¹²⁹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1月2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21 1.4，頁2。

¹³⁰ 「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2月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3。

¹³¹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2月6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9。

¹³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6月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14-15。

¹³³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6月8日），檔號：特30 395.1，頁14。

許少榮等打算於日軍投降後集合人槍落草為寇，並聲言「不得已將與沿海奸偽合作」，向中共投降。¹³⁴ 與此同時，中統在香港布置的武裝則正在此時失去作用。1944年底，日軍的廣東海防軍發生兵變，日本海軍駐廣州武官把廣東省沿岸的偽軍改編，大部交由甘志遠率領，所部共有900多人，並有火砲、機槍等重武器。垃圾尾島和三灶島等香港與澳門之間的島嶼均由甘志遠控制。¹³⁵ 陳素其後報告「莫俠部」被「調到外海」。¹³⁶ 其後不久，陳素報告殺敵先鋒隊的第二大隊長李雲生被日軍逮捕，部隊不能集中使用。¹³⁷

因此，日軍於8月初準備投降時，港澳總支部在香港的武裝部隊只有新近聯絡的姚定部（編為殺敵先鋒隊的第三大隊），該部聲稱擁有人槍約400，分布香港各地，另有華僑商會會長馬澤民於7月底向中統人員表示願意協助。¹³⁸ 由此可見，中統在香港的勢力確實有限，只能與力量有限的馬澤民聯絡，而非羅旭龢、羅文錦、何東、胡文虎等在港澳地區更有影響力的商業和華僑領袖。與此同時，中共的港九大隊在西貢、新界北，以及大嶼山均有武裝力量和據點，其組織和實力雖然遠未能左右局勢，但比國民黨強。另一方面，在香港的日軍則仍有7個步兵營（大隊）共4,000多人，另有砲兵1營和海軍特別根據地守備隊數百人。¹³⁹ 雖然這些兵力在盟軍反攻面前將不堪一擊，但應付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武裝力量仍然有餘。

由於缺乏具體預案，中統和港澳總支部對日軍投降頗有措手不及之感。一方面，港澳總支部不時要求中央指示，但忙於應付各地局勢的中央亦只能要求總支部與當地軍事負責人聯絡。日軍投降後，港九總支部向吳鐵城請示應否與英方聯絡，並是否立即把潛伏於惠陽附近的殺敵先鋒隊第一大隊開進九龍，並發動其他

¹³⁴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7月2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31。

¹³⁵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35；「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4年1月13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4；

¹³⁶ 到底莫俠是否存在？他是否為甘致遠？筆者並無資料證實。「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7月2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21。

¹³⁷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7月25日），頁21。

¹³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7月25日），頁22。

¹³⁹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11-315。

在港力量。¹⁴⁰ 可是，吳鐵城指示總支部「暫不得開入，一切行動須經張長官向華〔發奎〕許可」，並另電港九總支部「嚴防並撲滅共黨陰謀」。¹⁴¹ 與此同時，中共港九大隊則於18日向新界各地的日軍發動攻擊，被擊退後則開始占領新界部分郊區並向鄉民收稅。¹⁴² 英軍服務團則派人到赤柱拘留營和輔政司詹遜聯絡，後者於26日日軍容許下出營建立臨時政府。皇家海軍太平洋艦隊早於8月13日已奉倫敦命令組成一支編隊儘速到港接收。¹⁴³

至8月20日左右，總支部向惠陽進發時於泰美墟和美軍情報人員匯合，並得日人准許進入惠陽。¹⁴⁴ 在香港市區，中共勢力微弱，黨員人數只有10數人，國民黨方面則聲稱擁有姚定部，但由於日軍只向英軍投降，該部亦未能接收香港。至8月29日，香港報紙才提及該部存在，但英國艦隊已在香港外海，陸戰隊於翌日大舉上岸接管港島。¹⁴⁵ 其時，中統的工作目標主要為九龍，蓋英軍尚未登陸。香港支部書記羅光漢等於23日到港與駐港人員會晤，並聚集殺敵先鋒隊的人員。與此同時，九龍亦出現自稱中央代表的人員企圖「維持秩序」，沈哲臣亦提到九龍和新界「奸匪潛入頗眾」。¹⁴⁶ 陳素打算以投降偽軍為名，使國民黨武裝部隊可於新界和九龍公開活動，使之成為「我接收九龍之先頭部隊」。¹⁴⁷ 至9月初，港澳總支部與日軍協定進港路線，準備進入新界和九龍，並再次和「莫俠」取得聯

¹⁴⁰ 「沈哲臣致吳鐵城電」（1945年8月11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2，頁2。

¹⁴¹ 「吳鐵城致沈哲臣電」（1945年8月14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2，頁3；「沈哲臣致吳鐵城電」（1945年8月1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41。

¹⁴²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54；「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8月18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2，頁4。

¹⁴³ 以上詳見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頁394-409。

¹⁴⁴ 「沈哲臣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51。

¹⁴⁵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1，頁53。

¹⁴⁶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2日），頁54。

¹⁴⁷ 「沈哲臣致吳鐵城電」（1945年8月22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2，頁13。

繫，其人員更與英方開始接洽。¹⁴⁸ 可是，在總支部人員整理九龍黨務和武裝部隊時，英軍已於9月5日登陸九龍接收，總支部接收九龍的計畫始終失敗。可是，由於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已同意由英軍接收香港，蔣介石亦不願為香港與英美失和，因此即使總支部繼續其計畫，亦未必得到中央的贊同。¹⁴⁹

柒、結論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在港情報工作的成績可謂乏善可陳。自1930年代初以來，國民黨已開始在香港進行情報與地下工作，並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培植了一定勢力，特別在青年愛國學生、工人，以及幫會等圈子，其活動範圍以九龍市區邊緣以及港島中區為主，並以政治工作為重心，培養了一批熟悉香港的人員。1937至1941年間，在港國民黨逐漸浮上檯面，國民政府亦派出更高層次的人物到港加強與英國殖民地政府和軍方之間的合作。1941年12月日軍入侵香港，國民黨人員曾與英軍合作抵抗，部分人員亦與英軍一同逃出香港。淪陷期間，英國、國民黨以及中共均有進行持續的地下抵抗與情報活動。在市區，殖民地精英對英國仍然頗有信心，因此不少公務員以及上層人士願意與英軍服務團合作，使後者得以在港澳運作，並在戰爭結束時為英國收回香港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共於新界部分偏遠地區建立了據點，並在那些地區以相對統一的武裝部隊為後盾，其部分領袖如黃作梅等為盟軍留下良好印象，加上日軍並不認為它是主要威脅，因此得以穩步擴充。可是，這些兵力始終不是駐港日軍的對手，因此港九大隊在戰爭期間並未對日軍構成太大干擾，它在戰爭結束時的角色亦有限。即使中共在香港有據點及武裝人員，由於在港日軍始終有一定實力並保持秩序，中共在日軍投降後亦未能在香港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¹⁴⁸ 「陳素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2日），頁54-55；「陳素（沈哲臣代）致吳鐵城電」（1945年9月5日），《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檔號：特30 395.2，頁22。

¹⁴⁹ 呂芳上，〈一九四〇年代中英香港問題的交涉，1942-1945〉，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518-531。

與上述兩者相比，國民黨在港工作並不順利；這不能單純歸咎於日軍的反間諜工作或中共的阻撓。首先，在香港淪陷期間，國民黨在粵省地區的黨政軍建設頗為混亂，港澳總支部與粵省的黨政軍機關一直各自為政。失去廣州以後，國民黨在粵省雖然仍有據點，但對香港鄰近地區的控制始終力不從心。國軍在粵省的正規軍並不足以消滅中共武裝或挑戰日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國民黨又經常依賴收買來的地方武裝充當游擊兵力，始終未能在粵省沿海地區建立一隊可靠的游擊武裝。另一方面，身在香港的國民黨情報人員卻面對資源短絀而上頭指令不清的困境。在戰爭大部分時間中，中統在港人員只獲得有限的金錢與極少的物質支援，其人員在戰前大多進行政治情報工作，但中央卻要求他們完成不同範疇的任務，包括搜集關於日軍、中共、汪精衛，以及其他中國政治勢力的情報、進行破壞工作、嘗試擴大黨務吸收黨員、宣傳國民黨，同時又要不斷躲避日本情報人員的反間諜工作，甚至要建立武裝組織。以國民黨在港人員的人數、訓練，以及資源，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國民黨在港情報人員大多從事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情報工作，在戰前以至戰爭期間有一定成績，但要求他們提供軍事情報則明顯超出他們的能力和資源所能應付的範圍。

從事後觀之，中統香港站和英軍服務團被大規模破獲，而軍統電臺及港九大隊則未被日軍消滅，其原因與前兩者的行動性質以及人員組成有莫大關係，而非因為香港站拒絕和英方或中共合作。中統、軍統和英軍服務團的人員均以刺探軍事情報為主，而非在邊區建立據點和培植武裝力量，因此他們必然集中於市區活動。這些地區日軍擁有一些反間諜人員，而且鄰近日本軍事設施，日軍防範自然較強，其憲兵亦聚集在市區，在新界則只於墟市設有派遣隊。中統香港站與英軍服務團一樣，負責提供關於香港的各樣情報，其人員分散，但接觸面廣闊，而且部分人員經常要往返香港和中國大陸或依賴水腳偷運情報，被日軍發現的機會自然增加。與之相比，軍統在港情報人員則只有一項任務，即負責收集香港的港口和氣象情報並以電臺送出訊號供美軍使用。另外，中統人員在香港亦要肩負招攬黨員的任務，此亦增加整個情報網絡的曝光機會，加上部分人員與英軍服務團一樣是戰時加入的外行，因此較易被日軍破獲。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極為複雜，國民黨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對精英以至大眾的影響力始終有限，其黨務人員在戰前

以至戰爭期間始終未能打進香港的精英階層，只能繼續利用本來的網絡，在文化界、工人，以及幫會獲得支援。從國民黨在戰爭期間於香港的情報工作，亦可見該黨1930至1940年代在香港的發展侷限。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國國民黨特種檔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海軍一般史料》（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藏）

〈戰鬥詳報 戰時日誌〉。

《陸軍省大日記》（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藏）

〈陸軍省大日記〉。

《陸軍一般史料》（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藏）

〈主要部隊略歷表〉。

〈陸軍部隊（主として内地）調査表 昭和20年8月15日現在〉。

〈南支那方面部隊略歷〉。

〈陸軍北方部隊略歷〉。

〈步兵第96旅団歴史〉。

〈重要電報〉。

《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戴公遺墨——一般指示類〉。

War Office: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and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Defence Intelligence Staff: Files, WO 208 Seri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Guerilla activities. WO 208/254.

Condition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WO 208/3035.

War Office: General Headquarters, Allied Land Forces, (South East Asia) War Crimes Group: Investigation Files, WO 325 Seri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Trials and executions of British and Indian prisoners of war in Hong Kong by Japanese. WO 325/167.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ong Kong.

BAAG Intelligence Summaries. EMR-1B-01.

BAAG Intelligence Summaries. EMR-1B-04.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HKRS 211 Series.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Intelligence-Kweilin-Summaries. Section IIA – Naval. HKRS 211-2-2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HKRS 169 Series.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Photographs of Japanese Radar Site on Tai Mo Shan. HKRS 169-2-193.

二、專書

古 僧，《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臺北：博學出版社，1978年。

姬田光義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88年。

馬振犢，《國民大會特務活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臺北：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馬振犢、邢燁，《戴笠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馬振犢，《軍統特務活動史：民國第一特工組織的興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年。

張霽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

陳納德著，陳香梅譯，《陳納德將軍與中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

Aldrich, Richard.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Keegan, John. *Intelligence in War: Knowledge of the Enemy from Napoleon to Al-Qaeda*. London: Pimlico, 2004.

Kotani, Ken.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Oxford; New York: Osprey, 2009.

Luard, Tim. *Escape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de, Edwin.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三、期刊、專書論文

朱德蘭，〈從日本軍方檔案資料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過〉，收入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編，《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1996年。

呂芳上，〈一九四〇年代中英香港問題的交涉，1942-1945〉，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

李盈慧，〈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收入陳鴻瑜主編，《吳鐵城與近代中國》。臺北：華僑協會總會；秀威，2012年，頁65-88。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2007年11月26日）。

胡元度，〈香港情報英烈錄〉，《中外雜誌》，第38卷第6號（1985年8月）。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

Eyre, James, Jr. "Hongkong-British Naval Station and Imperial Outpost."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gazine*, 70/3/493 (March 1944).

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the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s Example, 1942-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9:1 (January 2015).

Martin, Brian. "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 1939-19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6:4 (Winter 2001).

小谷賢，〈日本軍と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成功と失敗の事例から〉，《防衛研究所紀要》，第11卷第1號（2008年11月）。

四、訪談錄、口述歷史

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郭冠麟編，《飛虎薪傳：中美混合團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年。